

亚洲共同体概念的回溯与展望^{〔*〕}

○ 章立明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自 2000 年以来, 亚洲共同体一词就不断地被提及并引发各方持续关注, 其实把历史与文化多样性的亚洲视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做法由来已久, 从东方主义的东方幻象到泛亚洲主义(Pan-Asianism)的亚洲共同体想象莫不如此。特别是后者可上溯至 19 世纪中后期, 并一直贯穿在诸如中日和中印关系的复杂历史进程乃至世界的近代思想史中, 时至今日对它的讨论仍然可能引发争论。通过梳理近现代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亚洲观, 我们可以发现亚洲共同体这个承载梦想概念的迷人之处, 但是从地理、种族和文明来整合共同体的做法已证明会遭遇现实的坚冰。当然, 要建构 21 世纪的亚洲共同体则需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并摒弃独断论思维。

〔关键词〕东方主义; 泛亚洲主义; 亚洲共同体; 地缘政治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7.021

在 2000 年首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 与会的 40 多个政党的部分代表呼吁建立一个以欧盟(European Union)为目标的亚洲共同体, 此后这一概念又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国家所提及。到了 2012 年, 当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授予欧盟时, 又引发了外界对“亚洲也应该有一个值得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地区组织的期许”^{〔1〕}。殊不知从地理、种族和文明层面, 把亚洲视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做法由来已久, 从东方主义的东方幻象到泛亚洲主义的想象共同体莫不如此。由于亚洲国家在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样性, 及其在近现代历史境遇中的差异性, 使得一个承载亚洲梦想的地区联盟组织值得

作者简介: 章立明,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本文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系云南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经费支持项目的阶段成果。

期待,但是只从地理、种族和文明来整合共同体的做法无疑会遭遇现实的坚冰。而打造当代的亚洲共同体则需要从地缘政治出发,摒弃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才能探索出合理的路径。

一、东方主义生产与制造的东方幻象

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词原指东方民族的特征、风格和风俗,1769年被侯德斯沃特(Holdswort)用来评论荷马的作品,后来成为研究东方各国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学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东方主义》(1978)一书中,揭示了作为地理概念的东方如何成为一个学术史上的专门领域,而且把一个在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东方简化为一个整体概念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

(一)被建构出来的东/西方概念

东方主义的词根东方(Orient)最初是一个方位名词,亚述人(Assyrian)把太阳升起的地方称为东方(亚细亚),原指希腊东面的小亚细亚半岛,后来扩展到欧洲以东的所有地区(其中主要是亚洲,也包括部分的非洲地区)。在东方主义看来,东方是与西方(Occident)相对而言的,它并非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西方也是如此,两者都是其建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点。因为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西方的概念,即使到了近代,对西方概念的讨论也从未达成过什么共识,而一个从未得到过普遍认同的西方概念与欧洲或者大西洋诸国划上了等号,则是与16世纪以来逐步成长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关。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1970)中就把1763—1914年称为“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因为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以外的整个非洲大陆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沦为了欧洲的殖民地。

正因为如此,东方主义是伴随欧洲列强的海外扩张与殖民侵略发展起来的,欧洲的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家以及殖民地的行政官员,通过学术发现、哲学重构、心理分析和社会学描述等途径,在“种类繁多的书面文件,从议会辩论的记录、官方的报告,到宗主国总督的回忆录、学者的详尽无遗的巨著、旅行者的故事、小说和诗歌等”^[2]中建构起与东方地理、东方习俗、东方思维和东方命运等有关理论和观点。东方主义的实质在于:(它)“不只是文化、学术、制度对政治课题的反映,不只是一系列分散的有关东方的文本,也不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压制东方世界的阴谋……它的意图在于理解和在某些例子中控制、操纵甚至吞并与西方不同的世界”^[3]。

(二)想象地域中的他者形象

作为两个地理实体,东西方本来可以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对方,因为东方不仅是欧洲的毗邻者,而且古老、富裕与文明的东方曾经是欧洲最强有力的竞争者,然而东方主义则是一套欧洲居于强势地位的理论 and 实践体系,使得

欧洲与东方处于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4]。作为东方主义最为常见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5]。当然,无论东方是“美丽风景”和“难忘回忆”的“异国情调”,还是作为“野蛮”“愚昧”“停滞”的被拯救对象,其实都无关乎东方自身的真实,只取决于欧洲看客根据各自的需要来界定东方的内涵,“想象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然后服务于这两个世界”^[6],东方主义赋予了东方作为想象地域的诸种特征,或者说是关于东方的幻象。

20世纪中期兴起的区域研究淡化了早期东方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殖民主义色彩,然而有关东方的主题则被不断地重构和重组,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在著述、报刊和研讨会上。由于东西方之间事实上存在的话语霸权,使得东方主义得以继续保留其古老内核,即东方的存在本身是西方实现自身行动的现实目标,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以东方作为他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权没有彻底改变之前,不承认东西方文明具有同等分量的话,那些关于东方和东方人的种种偏见与歧义还会以各种隐晦的方式一如既往地生产与表述出来。这样一来,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在妨碍西方认识与了解东方的同时,也会遮蔽西方认识与了解自身。

二、近现代史上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亚洲共同体想象

如果说东方主义建构的东方幻象具有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我们掉转目光看一下在东方内部的亚洲共同体想象也是如此。尽管亚洲人在亚洲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是缺席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亚洲民族在泛亚洲主义名义下建构起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想象共同体。可以说,这是源于亚洲国家遭受西方殖民压迫的遭遇,是在“西方的冲击下不断做出反应的结果”^[7],因为不建构一个与欧美相对应的空间,没有亚洲有色人种的联盟,就不可能真正战胜步步紧逼的西方列强。当然,日本、中国和印度不同的亚洲观赋予了亚洲共同体不断变化的内涵和外延,并最终影响到中日关系和中印关系乃至世界近代史的走向。

(一)日俄战争开有色人种战胜白种人的先例

萨义德说:“无论是谁,恐怕都不可能在与东方主义相对的位置上设定一个西方主义的领域……像东方主义这样固定的、试图占据总括性地理位置的领域,完全找不到可以类比的例子”^[8],其实只要转换一下思路以肤色来进行划分的话,白种人与有色人种完全可以构成这种类比关系,亚洲共同体的想象正是建立在“同为亚洲民族或者东方文化”的基础上,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就拉开了世界范围内有色人种觉醒的序幕。

1905年5月27—28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是近代以来首度由欧洲以外的国家在重要战争中击溃欧洲强国,开东方黄种人战胜西方白种人的先例。当这个消息从东亚迅速传遍全球时,对于所有的殖

民主义国家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对于亚洲和非洲乃至西方国家的有色人种来说则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从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到印度等国都引发了一系列的独立运动。孙中山就曾说过:“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所以日本战胜俄国的结果,便生出亚洲民族独立的大希望”^[9]。如1905年,中国只有8000人在日本留学,“两年后(留学人数)就激增至17860人,这些人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10]。

虽然日俄战争的实质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对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感到明显的屈辱感,这是因为亚洲黄种人被想象成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个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11]。如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就有“黄白之战”的提法,他强调以肤色为分界,联合日本进行黄种合作,抵制白种侵犯;日俄开战后他又对日本取胜寄以厚望,希望日本能够打败俄国,打击白种人横行于世的嚣张气焰,为黄种人争口气,他说:“呜呼!日本胜矣,黄种胜矣,亚洲胜矣,吾不能自解其何故而哀乐之交集于五中也……使俄胜日本,则东亚无国,黄种无人,非独中国亡而日本亦不能自立”^[12]。1909年,朝鲜安重根因击毙伊藤博文而身陷囹圄,他在狱中写道:“数百年来行恶白人种之先锋,一鼓大破,可谓千古稀罕事业,万邦纪念表绩也”^[13],也是从黄种人同盟的角度肯定日本战胜俄国的意义,并说这打消了自己对日本侵略朝鲜的“仇讎心情”。

(二)日本近代史上的亚洲观

1853年,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黑船舰队(Black Ships)侵入长崎,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1854)和《通商条约》(1856),此后,英法俄各国均要求签订类似的条约,日本被迫开放条约口岸、租界和治外法权等。作为对西方入侵和自身民族生存的回应,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日本亚洲观纷繁复杂,而我们将选取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和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进行分析,其实这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亚洲观都源自日本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虽然它们负载民族危机感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充当了日本“联合亚洲,抗衡欧洲”的舆论工具,最后被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战争。

1. 脱离亚洲恶友的脱亚入欧论

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一文中说:“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西洋文明)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14],他把日愈迫近的西洋文明比作不可阻挡的流行病,包括朝鲜和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并不具有抵抗的能力,它们已经在弱肉强食的现代社会中面临生存危机,用不了几年都会被白种人征服和殖民,其领土也将被欧美列强瓜分殆尽。由于对东方邻国的失望并且害怕自己被这些必定亡国的近邻所拖累,福氏主张与这些亚洲“恶友”迅速绝交,摆脱亚洲邻国而加入到欧美列强的行列中,他说:“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国民之精神已脱亚细亚之固

陋,移至西洋文明……为今之计,我国不可再犹豫踌躇,坐等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方文明诸国共进退”^[15],这就是著名的脱亚入欧论。

经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日本已经迅速跻身世界近代化国家的行列。在1899年,日本获得了对其国土上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成为亚洲第一个脱离西方控制的国家。1900年,当华北义和团兴起时,日本就抱有积极出兵的态度,后来反复游说英、德、俄、法、美、意、奥等国一起参战,最后成为出兵人数最多的国家(占全部兵力的38%)。事后,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日本又从中国的4.5亿两赔款总额中拿走了0.35亿两白银,用来扩充军事和本国的近代工业建设,可以说这是日本脱亚入欧得到的最实际利益。

2. 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一体论

1903年,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说:“亚细亚是一体。喜马拉雅山脉只不过是强调,而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分割开,它们是拥有着孔子的共同体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和拥有着韦陀式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16]。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东方文化为世界提供了“爱”和“美”,“恰恰是这爱是亚细亚所有民族的共通性思想遗产……这也是把他们从不顾人生目的而一味偏好寻找其手段的地中海与波罗的海沿岸的诸民族中区分出来的标志”^[17]。在冈氏看来,到了近代社会,中国和印度并没有将其古老的文明继承和发展下去,只有日本继承了亚洲丰富的历史,这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原因所在。

冈氏认为欧洲人统治亚洲的办法是人为地制造亚洲各国的分裂,而振兴亚洲的责任要由亚洲人自己来承担,只有亚洲诸民族联合起来实现“亚洲一体”,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西方的侵略,而日本则是“亚洲一体”当仁不让的主导者。在冈氏看来,在西方入侵的刺激下,只有日本从昏睡中醒来了,而中国、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依然沉睡不醒,既然日本已经醒来,就有责任帮助中国、印度及一切亚洲国家与日本一样实现近代化,“日本正在努力应付随近代社会而来的种种急务。带动亚洲,催其梦醒,成为日本的当下急务”^[18]。这种强调以日本作为亚洲主导者的日本责任说,最早出现在胜海舟、中村敬宇和樽井藤吉等人的著述中,特别是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1893)一书中,更是提出日本要与朝鲜合并,通过同一种族的“亲和”方式来实现“合邦”,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来抗御欧洲列强的侵略,后来这些说法都被置换成使日本充当东亚霸主合理化的舆论工具,最终导向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亚洲各国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战争。

(三)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亚洲观

1584年,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在肇庆绘制了首张世界地图《山海輿地全图》,包括亚洲观念在内的西方地理学知识才首次进入中国。1843年,随着《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书的出版,表明中国人已经接受了亚洲概念。我们知道亚洲同盟的目的是抵抗西方列强的进一步蚕食鲸吞,在整个20世纪前半

期,中国人的亚洲观可以划分为中日同盟和中印联合两种倾向,特别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愈膨胀后,联合同样深受压迫的印度便是中国亚洲观的新转向。

1. 联合受屈人民一起反抗的大亚洲主义

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亚洲观可以说是深受日本亚洲一体论的影响,如 1897 年,章太炎提出强调中日联盟的“亚洲和亲”论;1902 年,梁启超提出“亚粹”论,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同为黄种人应该团结一致并共同对外。随着中国知识界对亚洲一体论认识的深入,1919 年,李大钊提出的“新亚细亚主义”论,即“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步,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是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的……在我们只有希望亚人大家起来,扫除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19]。可以说,自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论一出,表明中国的亚洲观开始回应日本的亚洲观,或者说中国亚洲观已经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从孙中山本人不同时期的亚洲观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变化特点。1913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发表“亚洲主义”演讲,他说:“亚细亚者,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也……日本与中国则一家之兄弟也……假使此双生之兄弟,有阍墙之事,则亚细亚之一家,绝不能保持其平和。日本为亚细亚之最强之国,中国为东方之最大之国,使此两国能互为提携,则不独东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维持,盖无可疑者”^[20],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孙中山的亚洲观是以种族为基点,强调中日两国互为提携就能为东亚乃至世界带来和平。到了 1924 年,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学校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 5 团体再以“大亚洲主义”为题进行演说时指出:“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21],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大亚洲主义”指的是要为亚洲所有遭受欧洲列强压迫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已经学习欧美霸道文化的日本人提出警告“不要成为西方霸道文化的鹰犬”。

2. 中印联合就是谋求所有受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1907 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22],其宗旨就是“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23],特别突出了印度在亚洲的重要性和古代中印两国的联系,以中印联合的主张来取代之之前倡导的中日同盟主张。梁启超在《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中也认为,中国与印度同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就应该如同兄弟之邦一样,互相扶持与提携。1911 年,孙中山在温哥华在谈到建立亚洲同盟主张时,也强调要“唤醒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24],因为“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中坚”^[25]。孙中山又说:“我们讲大亚洲主义是为打不平,是求一切民众的和平解放……亚洲全部民族的独立运动才可以成功”^[26],即大亚洲主义其实是为亚洲所有有色人种在内谋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

孙中山去世后,他帮助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政治理念被蒋介石继承了下来,并致力于“印度民族自治之促成”,这可以从1942年2月蒋介石访印期间与甘地和尼赫鲁等人的谈话中得到确认。其实在此之前成立的中印学会(1934)以及中国学院(1937)都是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并多次出资相助的。蒋介石对甘地说:“此次以中国革命党员的资格,前来与印度革命党友人晤谈,目的即欲研究如何联合起来反抗侵略国家之方法,此乃中印两国求得自由之方法……如印度不能独立自由,中国也不能独立自由,而若中印两大民族不能得到独立自由,全世界人类亦无自由,且不能有真正的和平”^[27]。蒋介石对尼赫鲁也说:“中印两个民族假使真正能够联合起来,就是全世界的白人团结一致,也没有法子再来压迫我们。反过来说,假使两国不能联络,而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者,两国就永远没有独立自由的希望”。虽然蒋介石延续孙中山的亚洲观可以强化其执政的正统性,但是这确实是在客观促进了中印两国在20世纪30—40年代频繁的交往与互动,开创了中印研究的黄金时代。

(四)印度近代史上的亚洲观

我们知道在日俄战争后留学日本的印度人中,不乏深受日本亚洲观影响的人,他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过自己的亚洲观,如萨卡尔(Benoy Kumar Sarkar)的《印度教徒眼中的中国宗教:亚洲思想趋势之研究》(1916)和达斯《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1917)。在此我们以泰戈尔的亚洲共同体和尼赫鲁大印度联邦为例,虽然其整合共同体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都在复杂的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中遭遇挑战而最终失败。

1. 泰戈尔的亚洲共同体是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

1921年,在圣蒂尼克坦创立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是传播泰戈尔亚洲共同体思想的大本营。1934—1935年,中印学会分别在圣蒂尼克坦和南京成立,学会的宗旨是:“联系两国文明,研究学术,交流文化,培育友谊与合作,追求世界和平、博爱和团结”。当时印中两国的许多要人和学者都是中印学会成员,如印方的会长是泰戈尔,前后出任总统的普拉沙德、拉达克里希南和侯赛因都曾是中印学会会员;中方第一届会长是蔡元培,成员有戴季陶、欧阳竞无、太虚和徐悲鸿等人。中印学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建中国学院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永久性机构。1937年4月,“作为印中人民结合象征”^[28]的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成立,成为泰戈尔亚洲共同体思想扎根的最重要所在。首任院长谭云山决定以研究中印古代互动和英译汉文佛经作为中国学院的主要使命,并以倡导中印关系来推进亚洲共同体建设。当时,在《中印研究》《国际大学季刊》《大菩提》和《海潮音》等刊物上都刊登中印佛教历史和当代中印交流互动的文章,印中两国著名的学者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纳格(Kalidas Nag)、陈寅恪、周一良、徐梵澄、季羨林、金克木、巫白慧和法舫等都成为这股学术力量的关键人物。

相比利用学术研究来推进亚洲共同体的成功来说,泰戈尔首次访华倡议亚洲共同体的活动则是毁誉参半的。1924年4月,泰戈尔在济南各界欢迎会上的

演讲题目就是“中国与印度是兄弟”，泰戈尔把中印两国和中印两大文明比作兄弟，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产生任何不调和的异族感或者文化传统差异感。我回想起过去印度把你们当作兄弟，把爱心送给你们”^[29]。当泰戈尔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就说他对于亚洲共同体的未来充满信心，“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的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互相提携”^[30]。然而，此时的中国对于日本可能是亚洲的危险已经产生怀疑，再以博爱与和平来提倡三国的联合也许不合时宜。如陈独秀批评道：“大同主义，世界和平，废战，博爱，人类的努力本应该奔向此路，但有何方法使我们能够开步向此路走，能够除去横梗此路之障碍物，乃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31]。面对各种质疑与批评之声，泰戈尔最后不得不削减了演讲场次。为此，徐志摩说：“（他）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32]，即泰戈尔的首次访华其实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

2. 尼赫鲁以中印为亚洲轴心的大印度联邦设想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尼赫鲁就在自传中说：“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缅甸和锡金、阿富汗和其它国家”^[33]；1944 年，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更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大印度联邦”设想，即以中印作为亚洲的轴心，包括中国、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泊尔、泰国、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在内的印度支那联邦。尼赫鲁“大印度联邦”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前者指的是 1920 年前后英属印度殖民地以及所辐射的势力范围，如以英属印度作为东方殖民体系的中心，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防务内线；以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 1899）和约翰逊—阿尔达线（Johnson—Ardagh Line, 1865—1897）作为印度和中国的边界；将印度、缅甸边界至杜兰线（Durand Line, 1893）之间的领土作为安全内圈等。此外，随着印度移民的迁徙与流动，印度教与印度佛教也传播到了中亚、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对阿富汗、蒙古、日本、斯里兰卡、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成为当地占统治性的文化或者诸文化中的一极。

尼赫鲁认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34]。在印度独立后，1947 年 3 月和 1949 年 1 月，尼赫鲁以印度世界委员会的名义在新德里召集了两次亚洲关系会议，让亚洲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在一个“团结的亚洲”名义下探讨亚洲问题，即“亚洲将再次发现自己……欧洲主宰亚洲的显著恶果之一就是亚洲国家彼此隔离孤立……在本次会议和这项工作中，没有领袖，没有追随者，所有亚洲国家都将团结一致，以实现一个共同的任务”^[35]。

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尼赫鲁设想的大印度联邦中的国家都先后获得了独立，选择了不同的国家体制，并融入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力量和阵营当中，事实上宣告了尼赫鲁大印度联邦设想的彻底破灭。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迅速冻结了尼赫鲁在 1950 年代下半期倡导的“印度中国人民是兄弟”的甜蜜关系。

三、建构 21 世纪亚洲共同体的基本思路

正如米什拉在《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2012)一书中所要表达的核心：“摆脱传统的框架，寻求抑制西方国家对亚洲大陆日渐增长的支配欲望、寻找亚洲重生的道路，进而重塑亚洲”^[36]，而建立一个超越各自民族国家的边界，拥有共同历史渊源、共同文化知识甚至是政治认同的地区共同体无疑是一条亚洲重生的道路和重塑亚洲的方法。然而亚洲地区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人口数量都远远超过欧洲，一个类似欧盟的亚洲共同体需要学界与政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学术探讨来厘清思路则是学界责无旁贷的责任，当然，要建构 21 世纪亚洲共同体至少要遵循以下基本思路。

(一) 地缘政治下的亚洲共同体

随着日本的亚洲一体、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泰戈尔的亚洲共同体以及尼赫鲁大印度联邦等的相继失败，我们看到无论是以地理、族群还是文明来想象的亚洲共同体都先后失败了，因此热闹了一个多世纪的亚洲共同体概念就被搁置起来。特别是经过中日战争(1931.9—1945.8)和中印边境冲突(1962.10.21—1962.11)后，中日关系或者中印关系在领土或边界问题都变得“非常脆弱，容易被破坏，且非常难以修复”。我们不是说从地理、种族和文明角度来建构亚洲共同体不重要，而是说如果想“强调中印之间的文明互动或者想象两国在未来的同盟，对当前的地缘政治问题避而不谈”^[37]的话，这种偏于理想主义的亚洲共同体就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能够实现的机会也就微乎其微。如 2005 年，兰密施(Jairam Ramesh)在《CHINDIA 应该说得通：中国与印度之探讨》一书中就把中印两国国名的英文名称组合在一起，创造出“Chindia”(中印大同)一词，他认为印度和中国之间虽有分歧但是能够携手合作建立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但现实情况恰恰不是如此，要实现中印大同的理想并不容易。

相比而言，2012 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从地缘政治层面提出的“太平洋治下的和平”(Pax Pacifica)理念则要务实得多。他认为，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各有其职能，但是亚洲这个因旧日战争引发的紧张局势仍时时被激化的地区太需要成立一个兼具外交职能和安全使命的“亚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来避免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特别是越南、菲律宾、日本和印度都因为与中国有领土或边界冲突问题而向美国靠拢，当然，实现这一设想的前提是“美国认可中国崛起的正当性，同时中国接受美国继续在亚洲地区的存在”^[38]。

我国学术界对陆克文的提议尚无回应，目前关于亚洲地区组织的最新提法是 2015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概念^[39]，习总书记在“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四原则”的主旨演讲中提及大国责任、亚洲一体化、跨区域合作与地区安全事务等内容，当然，对这一概念的操作化

还需要学术界做出更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二)抛弃非此即彼独断论的亚洲共同体

作为 19—20 世纪亚洲知识觉醒和政治觉醒的标志之一,亚洲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亚洲受殖民压迫民族主体意识萌芽的表现,他们渴望重新认识自身文化和定位与西方的关系,因此,21 世纪的亚洲共同体建设要抛弃那种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而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之所以引发很大争议就是因为它是独断论的产物,即把“西方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和“东亚威权政治模式”对立起来理解。而在国际上,除了新加坡外,马来西亚政府和领导人也经常以“亚洲价值观”来解释和辩护自己的行为。

自 1980 年代以来,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地与全球化市场接榫,拉开了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幕。1990 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观”,即以儒家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为大旗,来抵制西方的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他说:“(两党制)不符合我们的天性……我们是一个亚洲社会”^[40]。“亚洲价值观”的轰动还在于它引发了西方国家的政府、媒体舆论和学术界的介入,如美国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1994)对其进行批评,同年,西方媒体在“亚洲新闻论坛”也对其进行了猛烈攻击,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肯尼迪(Paul Kennedy)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学者从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等角度也卷入这场论战。如从 1995 年开始,森就以演讲和公开讲座的形式对“亚洲价值观”提出尖锐批评,相关内容以《惯于争鸣的印度人》(2005)和《身份与暴力》(2006)结集出版。由于“亚洲价值观”难以概括亚洲历史上的经典以及亚洲当代的经验,因此,在森等人的提议下,“亚洲价值观”最后被修改为“东亚价值观”。

从 2009 年开始,美国、新加坡、中国和印度四国学者轮流举办研讨会来纪念泰戈尔诞辰 150 周年。这些都可以视为是国际学术界拓宽和深化对泰戈尔及其思想的研究,包括对泰戈尔亚洲共同体思想的重新认识。在泰戈尔看来,东方民族与西方精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也不应该是前者对后者的排斥,他说:“把我们的精神同西方精神割裂开来的当前的种种企图,犹同精神自杀……我东方民族应该向西方学习……但只说从西方获取援助是个错误,怂恿地方的狭隘性,它的结果除了精神的痛苦之外还能有什么呢?”^[41]如果说在泰戈尔时代“任何国家把别的国家拒之门外,都不能谋取独特的进步”^[42]的话,那么,在 21 世纪建构亚洲共同体就更不能说是亚洲国家关起门来,只用亚洲自己的材料来建构共同体的大厦,实践将证明这是徒劳无功的。

注释:

[1][38][英]戴维·皮林:《亚洲为何需要“亚盟”?》,新华国际,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0/29/c_123880680.htm,2012 年 10 月 29 日。

[2][3][4][5][6][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年,第 29、16、135、1、

54 页。

[7]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

[8] 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 <http://homepage.ntu.edu.tw/~kan/power/newsletter/news20040303-2-1.htm>。

[9][26]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在神户专题演讲会的演说》, 1924年11月28日, 孙中山著作数据库, <http://www.sunyat-sen.org:1980/b5/125.92.250.161/sundb/sundbzz/show.php?id=205>。

[10][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19章“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http://www.fox2008.cn/ebook/qqts/047.htm>。

[11][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叡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7页。

[12] 叶春芳:《梁启超与日俄战争》,《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7期。

[13][36][印] 潘卡吉·米什拉:《从帝国废墟中崛起:从梁启超到泰戈尔, 唤醒亚洲与改变世界》, 黄中宪译,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13年,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hb/top/9789570842371p1.aspx>。

[14][15][16][17][18] 史桂芳:《近代日本的亚洲观及其对中国的侵略》,《长白学刊》2002年第5期。

[19] 李大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国民》1919年11月1日。

[20]《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编印,第404页。

[21] 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409页。

[22] 1907年, 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陈独秀等人、印度旅日的达斯(Taraknath Das)和鲍斯(Rash Behari Bose), 以及日本等国人士26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 其后陆续加入的还有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等国人士, 是亚洲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组织。

[23]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 中华书局, 1979年, 第243—244页。

[24] 张敏秋主编:《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 重庆出版社, 2006年, 第72页。

[25] 孙中山:《致犬养毅书》, 1923年11月16日, 孙中山著作数据库, <http://www.sunyat-sen.org:1980/b5/125.92.250.161/sundb/sundbzz/show.php?id=205>。

[27] 段瑞聪:《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之分析》,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http://www.ch.zju.edu.cn/index.php?a=detail&c=index&id=10234&web=jjsandchina>, 2015年10月21日。

[28] 魏凤江:《在甘地先生家中》,《南亚研究》1985年第1期。

[29] 谭中:《1924年泰戈尔的中国演讲:中国与印度是兄弟》,《环球时报》2011年5月6日。

[30]《晨报副刊》1924年4月13日。

[31] 陈独秀:《大同主义与弱小民族》,《向导》1924年第67期。

[32] 徐志摩:《泰戈尔》,《文学》1924年6月2日。

[33][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尼赫鲁自传》, 张宝芳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年, 第697页。

[34][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齐文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年, 第57页。

[35] Pt.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194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09-01-09>。

[37][印] 沈丹森:《中印研究的兴起、发展与现状》, 陈源源译,《文汇报》2014年5月19日。

[39]《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 2015年03月29日。

[40] 庄礼伟:《亚洲的高度》,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9年, 第344页。

[41][42][印] 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 倪培耕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 第363—365、389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